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我们所理解的“湾区” □申霞艳

构建崭新的文化认同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布罗代尔将历史时间分为长、中、短三种时段,并以“结构”“局势”“事件”作为相对应的关键词,他们的研究模式被称为“地理历史结构主义”,这提醒我们:过往对历史的认知和判断往往囿于各种“短时段”的“事件”;而影响历史“长时段”发展趋势的是隐没于日常生活的深层结构。最近读到茅盾文学奖得主刘斯奋和批评家林岗的对话《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两位对话者高屋建瓴,从历史、思想、文化、艺术、审美、创新等诸多角度娓娓道来,反思我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指出当今要建构崭新的文化认同,必须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

广东的饮食文化很早就闻名天下,明末清初,诗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记载:“天下所有食货,粤地几尽有之,粤地所有之食货,天下未必尽也。”中西交流给广东带来了新食物和新方法,食物及做法的多样性决定了饮食文化可能的高度,“地理大发现”给人、物的大量流动带来契机。从“长时段”来看,“湾区”是“地理历史结构”的产物。从全球史来看,16世纪西方经由“湾区”发现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是从“湾区”开始的(港、澳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是“短时段”“事件”的结果);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南方谈话,也是从“湾区”开始的;湾区建设的奇迹为现代化叙事吹响了号角,激励我们探索智能时代的发展之道。

比具体的器物、有形的繁华更为重要的是内在的文化信念和无形的历史想象。日本福泽谕吉提倡的“脱亚入欧”和我国知识分子“五四”前后呼吁的“全盘西化”,都包含着一种进步与落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如今面对一种新的智能文明,到了需要重新反思和检校的时刻。古语说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善于汲取教训,从他者文化中学习是印刻在我们民族基因中生生不息的智慧。“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系列对话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梳理历史,指出现代性亦有不同范式。我们应避开“单行道”的思维盲区,根据具体国情和自身的文化传统,探索独特的中国现代化道路。微信公众号、自媒体转载使此对话广为传播,话题仍在持续发酵。

大湾区,新时代

改革开放将我国带入了现代化的新赛道,给整个国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作为海上中西交流的要塞,粤港澳大湾区更是获得非凡的发展能量,经济、科技、文化彼此借力,比翼齐飞。大湾区文化一直在不断摩擦生热、互渗融通、成长更新的过程中,吸引了各个领域的人才。

由具有与中原阻隔意义的岭南升华到真正有“面朝大海”而向世界开放的湾区,文学亦凭此东风扬帆起航。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中指出,“描写地区体验的文学意义以及写地区意义的文学均是文化生成和消亡过程中的一部分……它们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空间被赋予意义的时刻。”粤港澳大湾区融为一体也将为文学提供新契机,文学创作、文学刊物与出版、文学评论、文学教育乃至整个文学生活都可能脱胎换骨,蔚然可观。湾区不仅为女性提供新职业,更为女性提供新生活,生产新思想、新价值。张欣的《黎曼猜想》《狐步杀》和《千万与春住》等作品弥漫着浓郁的南国都市气息,塑造了一批独立、自强、自信的创业女性。彤子的《生活在高处》记录建筑女工“高处”的生活,彰显劳动女性的尊严。蔡东笔下的女性渴望拥有丰盈的自我。今天男女平等有通过共同提高来实现的可能。

张欣、鲍十、董启章、邓一光、杨争光、南翔、艾云、杨克、熊育群、詹谷丰、江冰等资深作家一直笔耕不辍,随时张开感官领略大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书写与时代共振的作品。鲍十的“鸟叙事”系列显然是这位来自东北平原的作家对海洋文明的思考结晶。广州作为广东的省会城市和湾区文化的领头羊,其低调、务实、包容吸引了王威廉、郭爽、冯娜、陈崇正、皮佳佳、梁宝星等一批青年文艺工作者,湾区文化将形成新的凝聚力。人才在大湾区内部的流动也是值得留心的风景,比如盛可以、庞贝、黄灯等,他们都为湾区文化刻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黄灯的《我的二本学生》已成为现象级图书,成为非虚构代表之作,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青年作家葛亮、周洁茹定居香港,香港很多年轻学子到内地求学写作,这种双向流动会丰富香港文学的叙事维度。葛亮一只眼盯着香港,另一只眼回望六朝古都南京。新作《燕食记》致力于以饮食文化为切口窥探湾区文化的底部,这块有着千年商业交流史的土地深处流传的秘密,经由美食承载的家国情怀得以敞亮。“民以食为天”再次提醒我们反思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以及文化与生活的唇齿相依的关系。

深圳的城市气质以高科技、高效率、高素质著称,“来了就是深圳人”吸引着全球来客。深圳文学历史不长,曾与打工文学、底层文学、城市文学等符号短暂地联系在一起,今天,深圳文学飞速迭代,展现出前沿性和未来性。

邓一光南来之后不断地发现深圳、书写深圳,他将深圳二字镶嵌在小说标题中,将深圳作为叙事地标凸显于字里行间,将深圳独特的魅力传递给无数读者。长篇小说《人,或所有的士兵》超越深圳,将目光投向1941年的香港保卫战,通过讲述郁漱石被日军俘虏之后,在位于药岛丛林中的D战俘营度过的囚禁生活,展现民族国家的艰难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多年前这场艰苦卓绝的保卫战蕴含着这片土地的未来。吴君的《皇后大道》《万福》等作品堪称深圳与香港的“双城记”,对香港的关注使她的书写获得了特别的视角和叙述空间。虽为南下作家,但吴君有积极的在地意识,《亲爱的深圳》犹如内心的宣言,与众不同的获得感、融入感让她吸收源源不绝的写作资源。旧海棠的写作提醒我们深圳文学与内地广阔而错综的精神关联,新生从剧痛中来。自媒体长篇《消失的名字》中,“我”娘家所经历的接二连三的悲剧不仅打击着上了年纪的父母,也深深地刺激着“我”以及现在的家庭关系。最古老的内地乡村和最耀眼的大湾区

从“长时段”来看,“湾区”是“地理历史结构”的产物。从全球史来看,16世纪西方经由“湾区”发现中国;1840年鸦片战争是从“湾区”开始的(港、澳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是“短时段”“事件”的结果);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南方谈话,也是从“湾区”开始的;湾区建设的奇迹为现代化叙事吹响了号角,激励我们探索智能时代的发展之道。湾区战略恰逢其时,共同的地缘、方言、文化“积淀”而成的湾区想象将弥合“中时段”的制度差异,乘风破浪,“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就是这样血脉相连,彼此相依。从较早的《绿皮车》《老桂家的鱼》起,南翔就对小人物的命运倾听着同情和怜惜。新作《伯爵猫》以经典的“横截面”结构短篇,以疫情期间“伯爵猫”书店关闭前举行的告别晚会来表达作家的忧思与愿景。文尾“伯爵猫”三个字重新亮起。在智能文明与传统印刷文明的残酷竞争中,实体书店倒闭的命运不可避免,但书店曾经存在的温馨将长久地存留在读者的记忆中,而且阅读始终会给人类带来光亮,不过是换一种形式。

未来视野与人文观的升级迭代

乡土文学大多是忆旧的、怀乡的,通往故乡、童年和“乡土中国”。而城市文学向前看,思考人类的未来,思考时代重大命题。经由王十月、盛可以、郑小琼、塞壬等作家的努力,打工文学不断升级,大湾区收纳了异乡人的“乡愁”,以新奇、忙碌、快节奏的职业生活让他们慢慢建立起此在认同。慧慧的《闯广东》、厚圃的《拖神》、林棹的《潮汐图》、莫华杰的《春潮》等长篇共同见证了大湾区的成长。路魁的《夜叉渡河》颇具实验精神;皮佳佳的《庭前谁种芭蕉树》、马拉的《沈先生字复观》则具有古典气质。陈再见的《马戏团即将到来》向诗化一脉努力。林培源的《灰地》写一位哈尔滨手艺人背井离乡来到南方,一北一南巨大的地域差异形成审美上的张力,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相撞击,外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微妙和冲突,身份认同的难度得以凸显。陈崇正的近作关注抗疫,《开窗》实写主人公勇敢地打开心窗,虚写为读者打开的非洲之窗。对非洲我们是非常陌生的,我们讨论的西方可以简化为欧美,被遗忘的非洲同样是全球化的一维,是我们的镜像。实际上,19世纪就有华工被贩卖到非洲的种植园工作,江门碉楼存有早期华工屈辱的照片,这是被动全球化带来的痛苦。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心平气和地与这种悠长的历史进程对话,就会深度理解全球化,重新理解现代中国。马拉的《沈先生字复观》将当今日本科学家的寻根之旅与当年伶仃洋上的海盗、倭寇、当局及洋船的对抗联系起来。历史不可追,但旧式生活中崇尚读书、崇尚气节的士文化传统依然闪光。

王威廉的作品以哲思见长,《野未来》等近作借鉴了科幻小说的成果,《你的目光》以开眼镜店的男子追求眼镜设计师的故事来承载大湾区的过去和前景。眼镜在小说中既是道具,也是隐喻,借助高科技、时尚化的眼镜我们可以凝望未来、期待光明;借助“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等诗句抵达掩藏最深的自我。

蔡东在改写我们对现代都市的刻板印象——冷漠,她在孤独、冷漠之下发现了温暖、温情,对打工文学进行升级改造,将现实的苦难藏到冰山之下。新作《月光下》尝试着表达一种崭新的都市观和人文观,忧伤而温暖的情感弥漫其间。小姨和“我”兜兜转转相逢于深圳,小姨身上凝聚着“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生活十分沧桑,曲折艰难中依然有一种乐观、体贴。蔡东过滤掉大起大落的激荡,摒弃廉价的抒情,慢慢敞开心扉去贴近劳动者的自尊、从容和美好。

集中阅读青年作家的作品,能够感受到南方写作的新质:开阔的叙事视野。如果说用“全球视野”过于大,至少有一个对比性、超越性的视野和空间,有助于凸显文化的杂糅性。

庞贝的新作《乌江引》以郑重的态度重述红军长征途中突破乌江的转折史,作家为此进行了大量田野调查,爬梳多种史料,并借鉴非虚构的写作方法重构历史忧伤和传奇想象。史实与虚构之间的博弈构成一种巨大的张力。庞贝以虚构的智慧复活了一个智慧群体,大写“破译三杰”的智慧,“狭路相逢勇者胜”,谋略和勇气需比翼齐飞,赫赫有名的英雄和默默奉献的智者一道谱写辉煌的新篇。张况的章回体历史小说《赵佗归汉》(五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俱备,可以视为湾区(岭南)前史。

话剧《深海》以“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故事原型,讲述波澜壮阔的“深海”中核潜艇研发团队默默奉献的爱国精神。《大道》见证了中国电讯零的突破,从无至有,再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艰难蜕变以及整个民族国家的万千变化。“大道”既指主角尤道生的人生大道,也指民族国家的历史大道,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从闭塞的农业文明到开放的海洋文明……不同的文艺形式合力谱写了一个具有前瞻性、丰富性、开放性的大湾区。

历史学家赫拉利在他的“简史系列”中指出:人类发展的总趋势是全球化。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依据。无论当前有多少逆全球化的举动,大自然安排的疫情抑或人为挑起的战争都无法逆转这种大趋势。湾区战略恰逢其时,共同的地缘、方言、文化“积淀”而成的湾区想象将弥合“中时段”的制度差异,乘风破浪,“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描述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我认为应该是蓝。蓝是海洋的颜色,也是天空的颜色;蓝是宁静的颜色,也是环保的颜色;蓝是科技的颜色,也是未来的颜色;蓝既是对大湾区地理的一种写实,也是人们对更美好未来的一种愿景。假如说有一种“湾区蓝”的话,它不是一元,而是斑斓。追寻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其实质可能就是眺望一种更高的蓝。

眺望一种更高的蓝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片论

□陈培浩

“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以下简称大湾区文学)概念的提出乃是粤港澳大湾区这一经济规划概念推动的产物。大湾区文学概念的提出包含了这样的预设:一个区域的经济繁荣离不开文化所缔结的认同共同体的助力。这种预设某种意义上为所有参与者提出了一个深刻而艰难的价值命题,即文学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担负起建设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的任务。全球化、地球村的时代,文学如何在具有多种文化类型和多元社会制度的区域中建构起一种勾连你我的身份认同,这可能是这个概念更深层的使命。

讨论大湾区文学,有两种基本路径:一种面对现实和历史,一种则面向未来和可能。所谓面向现实和历史,是指对大湾区所属空间的文学现象进行现实和历史梳理、文化概括和精神提炼。这是一种面对存量进行工作的思路,它使粤港澳三地的文学现象和历史文脉得到全面的检视,从而为三地文化同脉同源做出论证,为三地文化更紧密融合寻找契机。这种工作当然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它并不创造增量。因为在没有大湾区文学概念之前,分别基于粤、港、澳的现实和历史梳理并非没有,假如在大湾区文学框架中,仅仅是将以往三地的文学存量做加法,在某种意义上浪费了这一概念应有的未来性文化潜能。在我看来,讨论大湾区文学,不能忽视其面向未来的维度。所谓面向未来和可能,是指对大湾区的界定,不仅着眼于区域历史文化,更关注技术迭代和时代新变赋予大湾区的新质,以对文明转型的预判,把握大湾区将为中国当代文学创造的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如此,作为增量的大湾区文学才具有更加建设性的意义。

应关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所提供的独特文学经验:

其一是独特的“新城市文学”经验。大湾区不是一般的城市群,而是最具高科技含量的城市群。所以,大湾区贡献的城市文学经验,不是传统的城市文学经验,而是一种带着未来性的新城市经验。只有从“新城市文学”视野来提炼大湾区的文学经验,方能彰显其独特性。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学正在发生崭新转型,科技使人类的生活及赖以信仰的价值话语正在发生巨大变化。香港是全球著名的金融中心;深圳则汇聚了中国最多的高科技公司,科技创新与人类未来生活的可能性。这些经验既是人类未来将共同面对,并正引起热议的话题,也是最具“大湾区性”的文学经验。

其二是高速城市化过程中独特的中国新工人文学经验。作为大湾区重要组成部分的东莞、深圳、佛山等珠三角地区在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发展中,催生了与之匹配的新工人文学经验或新移民文学经验。这是在世界文学视野中最具辨析度的中国文学经验,这些经验正来自于大湾区。

其三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汇下中国与世界文学的融合经验。大湾区必然追求一种具有自主性的文化,但大湾区也坚持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文化襟怀。大湾区与其他区域不同就在于它是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桥头堡,大湾区的天然属性就是开放和创造。大湾区是一个面向未来、面向创造而做出的规划,所以敢于在融合中创造便是大湾区文化的内在基因。大湾区文学这一必须以实践来充实的概念,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召唤在于,有效地建立一种自我与他者、本土与世界的平衡和循环。

二

下面将从交融互嵌来观察21世纪以来的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视野及篇幅所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不过是提供一孔之见。

城市经验无疑是大湾区文学最核心的经验之一,但城市经验并不同质,城市有多张面孔。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就一直有城的存在。这是一种有根之城,它维系着一个城市与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关联。城市的另一副面孔是都会,作为高科技巨型都会的“新城市”却是去根性、同质化,景观化的。纵横交错的高速交通网络,无

处不在的镜面摩天大楼,行色匆匆、衣着收容千篇一律的都市白领……这是“新城市”大同小异的面孔。城市的第三副面孔是底层,那些从农村进城者的烦恼与泪水、梦想与奋斗,正是中国现代化景观的重要构成,不能被城市排除在外。在我看来,大湾区文学的城市书写颇有意思地呈现了不同的城市“内面”和城市想象。

大湾区的城市书写内部同样是交融互通的。香港作家刘以鬯、西西、黄碧云、陈冠中、董启章等几代作家对大湾区其他作家的影响甚巨;有趣的是,葛亮、周洁茹等从中国大陆出道的作家,也充实了香港文学的城市书写。大湾区的城市书写是多彩的:西西《我城》《飞毡》的后现代城市书写启发了几代大陆读者;张欣《对面是何人》《千万与春住》书写都会之女性的精神历程和难题;邓一光的“深圳三部曲”(《深圳在北纬22°27'—22°52'》《你可以让百合生长》《深圳蓝》)在现代城堡中想象人的出路,人们得以从中辨认城市诗学的内在秘密以及城市书写的文学伦理;魏微的笔下虽无多少城市景观,但她写城市男女情事中的挣扎和尊严,写情爱纠葛中的伤害与原罪,以同情为文学伦理,以同情为城市疗伤;王威廉是一个感受城市新变,以城市为对象,也以城市为方法的作家,他探讨文明转型期的城市裂变,用历史和未来的目光去眺望;黄金明则以胶囊公寓、人造天空、人造宇宙、逆进化的人等异化想象,探询未来城市的可能裂变;蔡东的《星辰书》既写城的困境,也写人的光芒……事实上,谈论大湾区文学要求一种尊重整体和差异的辩证眼光。对整体性的强调不应抹平个体的差异,对差异的尊重也不意味着放弃对整体观照的追求。

三

乡土或望乡同样是大湾区文学的重要面向。乡土并非被现代化彻底淘汰的生活方式,乡土同样是现代性的重要构成。现代之城有多焦虑,望向乡土的表情就有多复杂。熊育群的《连尔居》书写了“现代”对乡人构成的惊骇和诱惑,关注“现代”渗透和改写“乡土”的过程,以有根的语言追问现代性语境下的精神根系问题。鲍十在广州望东北,《东北风情写生集》关怀女性、弱者以及历史河流中那些微如草芥者的命运,既有历史、传说、民俗等恒常的东西,也有外面世界侵蚀,乡土将逝的现代性感慨。同样,周洁茹也在香港望故乡。写很多有关家乡饮食的散文,似口腹之乐,实乡关之情。陈继明的《平安批》既是历史题材,也是乡土题材。平安批不仅是一种家书及邮汇凭证,更是海外游子与故土家国精神连接的信物,是中华文化向心性、主体性的投射。这是一种家国化的乡土。厚圃的《拖神》书写潮汕族群向海而生、一往无前的精神伟力,此种族群精神同样也是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厚圃召唤“拖神”精神,有类于尼采召唤酒神精神,都是为现代和当代转型中的民族灵魂凝神聚力。陈崇正也是擅长乡土题材,他惯于将故事和人物“栽种在一个叫半步村的虚构之地”,形成了一种文学地理与民族寓言映照的审美效果。其长篇小说《美人城》前部乡土而下部科幻。“美人城”从上世纪80年代乡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实体空间变成一个带有强烈体验性的拟真游戏空间,其间也寄托了作者对于人类的生与死、过去与未来、时间与空间的宏大思虑。这种充满未来性的思考绝不是偶然的,它正是大湾区生活经验的结果。

如果用一种颜色来描述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我认为应该是蓝。蓝是海洋的颜色,也是天空的颜色;蓝是宁静的颜色,也是环保的颜色;蓝是科技的颜色,也是未来的颜色;蓝既是对大湾区地理的一种写实,也是人们对更美好未来的一种愿景。假如说有一种“湾区蓝”的话,它不是一元,而是斑斓。追寻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其实质可能就是眺望一种更高的蓝。对于“大湾区文学”,我的基本看法是:面对历史研究,面对未来写作。对文学而言,沉淀在历史中的审美传统必须尊重,但只有面向未来的才能创制新的美学。

